

荒漠中的恐怖

——评美国现当代哥特式小说的主题思想

何 木 英

内容提要 哥特式小说是盛行于18世纪后期及20世纪早期的一种神秘、恐怖小说。本文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哥特式小说体在美国再度兴盛的原因,分析了福克纳、麦卡勒斯、奥康纳、卡波特、杰克逊、赖特等以哥特式小说为主的美国现当代重要作家的代表作所揭示的主题思想:传统制度的没落、传统道德的沦丧、基督信仰的崩溃、孤独中的变态恋、隐身黑人的抗争。

关键词 美国 哥特式小说 主题思想

人生只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装腔作势的拙劣戏子,
登场片刻便悄然退下,
它像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
充满着喧嚣与疯狂,
却无丝毫意义。

这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中麦克白富含哲理的独白,也是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嚣与疯狂》(1929年)书名的出处,它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生如演戏,世界是荒漠——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真实写照。

一 哥特式的隐喻

20世纪的美国是一片冷漠、荒凉、恐怖的荒漠,是社会制度没落、传统道德崩溃、理想幻灭、孤独绝望、充满暴力的畸零世界。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们从哥特式的破败、怪异、恐怖和古老的形式中发现了新的、有着普遍意义的人类隐喻。

哥特式最早是指中世纪的艺术,特别是建筑风格。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S.H.沃顿曾经指出,这种非常难看的建筑简直就是野蛮的产物,应该从明智者的视野里驱逐出去。到了18世纪,哥特式建筑已被烟熏火燎,变得破旧、肮脏不堪。然而,被新古典主义教条(理性、自然、合适等)所禁锢的小说家们,力求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终于从哥特式建筑的扭曲想象中寻求到了要找的东西,从此出现了哥特式小说。1764年,英国作家荷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年)出版了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哥特式小说便在欧洲流行开来,直到19世

纪 30 年代才开始走下坡路。这一时期的哥特式小说多半讲述古城堡或破旧的教堂、寺庙中闹鬼的故事,用虚构的、恐怖的、超自然的情节表达腐朽、凄凉的主题思想。到了本世纪 20 至 50 年代,哥特式小说在美国再度兴盛,许多重要作家如福克纳、麦卡勒斯、奥康纳、卡波特、杰克逊、赖特等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哥特式。这一时期哥特式小说的故事不再发生在破旧的教堂、寺庙,也不再有魔鬼、幽灵等,作家们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他们深入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深处去探索隐藏在那里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绝望的恐怖,表现畸零世界的畸零人,其中渗透着作家们对现实的深刻感受和认识。

二 传统制度的没落

社会的动荡不安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没落感、危机感笼罩在美国上空。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从经济上救了美国,但战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秩序瓦解的标志。战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幻灭感和没落感。1929 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更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接着是黑人民权运动,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50 年代的美国又进入了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年代,人们既害怕苏联对其发动原子弹战争,又害怕席卷全国的麦卡锡“剿巫(共产党)”政治迫害。60 年代的黑人抗暴运动、学生运动和侵越战争造成了一系列创伤。这一切同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大量失业、犯罪和吸毒结合在一起,使整个美国变成了一片混乱、恐怖、凄凉、衰败的荒漠,人们看不到一丝希望,连万能的上帝也“死了”(尼采语)。

残酷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作家们的心,特别是在南方(内战中参加叛乱的东南和中南的 7 个州)这块长期保守、落后、具有浓烈封建旧式农业生活方式的特殊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侵入把它搅得天昏地暗,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人们在各种异化力量面前惊惶失措……因此,在表现没落感、无根感、疏离感、孤独感、怀旧感这些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主题时,这片曾经是“文化沙漠”(门肯语)的地方,奇迹般地出现了“南方文艺复兴”,并统治美国文坛近半个世纪(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在“南方作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威廉·福克纳(1897—1962 年),他不仅是一位南方作家,还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不仅具有浓烈的南方乡土气息,而且超越了狭隘的地区观念,写出了有着普遍意义的形象和各种情况下的人性表现,反映了现代人深刻的精神问题。其中,《喧嚣与疯狂》和《押沙龙,押沙龙!》(1936 年)最具代表性。

《喧嚣与疯狂》充满了哥特式小说的荒诞与恐怖。它讲述了 20 世纪南方世袭贵族康普生一家的命运。康普生夫妇有四个孩子:昆丁、凯蒂、杰生和班吉。凯蒂美丽、热情、开朗,却被一纨绔子弟玩弄,后又被丈夫遗弃,最后沦为妓女,康普生因此被气死。哥哥昆丁是一个大学生,因为无法保护妹妹,也因无力分担家庭责任,更因他与妹妹间的乱伦爱情,最后自杀了。小弟班吉是一个白痴,需要姐姐的保护。唯一能适应现实的杰生,却成了金钱的奴隶,失败与仇恨使他变成了没有理性的复仇狂和虐待狂,他逼使小弟班吉进了收容所,侄女(凯蒂之女)走上了母亲的老路。《喧嚣与疯狂》描绘了一幅南方旧制度的解体图,康普生一家曾是南方的名门望族,如今,旧制度解体了,家庭崩溃了,他们都成了无法理解社会、无法适应社会的牺牲品。

《押沙龙,押沙龙!》也是一部充满哥特式神秘、恐怖、血腥、怪诞的长篇历史巨著。它讲述了

新贵庄园主赛德潘一家的兴衰史。赛德潘是南方一位穷白人的儿子，因受够了富人的歧视，决心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他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成了种植园主，并娶妻，生下儿子查理斯·帮，当他发现妻儿有黑人血统时抛弃了他们，又回到了美国南方，从印第安人手中骗得土地，靠残酷地剥削黑人建起了大宅院，成了当地大富。并又娶妻，生下儿子亨利和女儿裘迪斯。但是，几十年后，他的荒唐、疯狂的行为遭到了现世报应。查理斯与裘迪斯相爱并准备结婚，为了隐瞒真相，赛德潘唆使亨利杀死了查理斯，之后自己也被人枪杀，最后，一场大火烧掉了一切，唯一剩下的是一个白痴混血孙子。从赛德潘的发迹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罪恶、肮脏的历史，南方旧制度的崩溃，预示着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必然趋势。

三 传统道德的沦丧

平等、自由、民主、博爱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然而，一当这种制度成熟，它们便成了纯粹的幌子，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会导致弱肉强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人吃人的社会。英国批评家卡莱尔在他的著名政治小册子《今与昔》（1946年）中指出：“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但我们公开信仰最彻底的分离和孤独。我们的生活不是互助，而是在‘公平竞争’外衣下互相仇恨。我们忘记了现金付款并非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普通人只能是社会法规、习俗和传统的受害者。在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有父亲唆使儿子杀儿子的悲剧，在他的另一部著名哥特式小说《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1930年）中，有爱人杀爱人的悲剧。在美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这类悲剧非常多。

1948年，美国恐怖小说大师雪莉·杰克逊（1919—1965年）发表了她的代表作《抽签》，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作了最深刻最辛辣的讽刺。它讲述了一个繁荣的现代文明小镇一年一度的抽签仪式，谁抽到那支上面画有一个黑点的签，谁就被选为最后的祭祀品，让公众乱石砸死以祭祀丰收之神。在死亡的笼罩下，朋友出卖朋友，丈夫出卖妻子，母亲出卖女儿，儿女砸死母亲……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左翼犹太评论家的妻子，对现实的认识是深刻的。她运用形象的比喻、强烈的对比、不动感情的叙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骇人听闻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原始、残酷、野蛮的图画，从而使该小说成为一部鞭笞现实的力作。如用“签条上的黑炭是萨默斯先生（当地的煤炭老板）和格力夫斯先生（小镇的邮电主）在抽签的头天晚上在萨默斯的煤炭公司办公室用粗重的铅笔画上去的”，抽签是在萨默斯先生“向格力夫斯先生宣誓后主持的”形象地说明了看似公平、民主的抽签，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和地方行政长官操纵的，并渗进了资本家的肮脏利润。用“装签的黑色木箱已破旧了”和支撑木箱的凳子“只有三条腿了”来比喻传统的腐朽、没落。

四 基督信仰的崩溃

长期以来，基督信仰一直是西方人精神生活的核心。然而，到了20世纪，基督教的衰落已成为社会现实，从宗教改革、新教革命，到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逐步世俗化的过程，人们变得狭隘、自私，仅仅以物质追求和物质满足为生活的中心。这种社会现实引起了作家们的强烈关注，“南方才女”、“罗马天主教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3年）就是其中之一。她离群索居，长年在死亡线上挣扎（患有不治之症狼斑疮）。由于她生活在南方腹地宗教盛行的“圣经地带”，因此，她仿佛是一位站在云端的高人，将尘世看得特别清楚。对那些毫无精神信仰的“现代人”，她极度鄙视，在《启示》（1971年）中，将他们比喻为猪圈里吃饱就

睡的“可鄙的丑陋的猪猡”；在《好人难寻》(1955年)中，将他们比喻成树上的猴子，整天“忙捉自己身上美味可口的跳蚤”；对那些社会弊端的受害者，对那些辗转于信仰与失望矛盾痛苦中的人们，她却充满同情。奥康纳认为，“我是从基督教的正统观念出发理解生活的意义，生活的中心意义是与基督救赎(Redemption)人类分不开的”。因此，她表示“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人们，至少我很清楚自己是为这些人写作的”。她的两部中篇小说，31部短篇小说几乎全是宗教寓言故事。在《慧血》(1952年)中，主人公莫兹从军队回到家里，企图建立一个“没有耶稣的教堂”来否定上帝，然而“在他心灵深处的森林中穿着破衣服行走的人物”却是耶稣。在《强暴夺走了它》(1960年)的结尾处仍是主人公“朝着那黑暗的城市走去，那里沉睡着上帝的孩子们”。奥康纳深受福克纳的影响，恐怖的情节和怪诞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奥康纳式南方哥特式小说体，她被公认的代表作是《好人难寻》。

《好人难寻》以诙谐的口吻讲述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恐怖故事。贝雷驾车带着全家六口人外出旅行，中途老母亲突然想起年轻时参观过一座庄园，于是说服全家前往。在一条崎岖的偏僻山路上，车翻了。这时来了一辆卡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老妇人脱口说出其中之一便是今天早上她在报纸上看到的越狱逃犯“不适宜的人”。“不适宜的人”一边礼貌地和老妇人谈论“好人”、“上帝”，一边指挥同党枪杀了其他五人，最后亲自朝老妇人胸口开了三枪。他认为这是对上帝和人类的报复。“不适宜的人”曾在教堂里唱过圣歌，曾经种过地、当过兵、娶过妻，却被人诬告犯有杀父罪锒铛入狱，没有人为他申辩，无所不在的上帝也不肯显灵，可怕的铁窗生活使他失去人性。他认为是“耶稣把一切都搅乱了”，因此，他“除了伤天害理，别无乐事”，这其中表达了他对社会、宗教的绝望，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他一边不停地杀人，一边痛苦地自言自语：“假如我真见过上帝能起死回生，我一定会是另一种人了。”老妇人临死时看着他的痛苦矛盾，拍着他的肩，同情地说道：“哎，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啊，你也是我的一个亲生儿子啊。”这话更像蛇咬住了他的胸口。奥康纳在谈到“不适宜的人”的未来时说道：“我不愿把他同魔鬼等同起来，我宁愿认为，不管可不可能，老太太死的姿势会像芥子种子一样，在他的心中长成站满乌鸦的大树，使他痛苦不堪，这样他一定会成为他注定要变成的先知。”作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的奥康纳力图用她的作品说服人们皈依上帝，然而，她的主人翁对上帝的归顺与其说是主的召唤，不如说是对现实的绝望与逃避。

五 孤独中的变态恋

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孤独已成为笼罩一切的主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总是紧密地从属于一个社会单位，这单位可以是家族、民族、村社、教会，人不仅终身归属之，而且很少变动。因此，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然而，到了交通、联络工具高度发展的现代，在各种异化力量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却越来越大。麦卡勒斯曾把孤独称为“美国病”，其实，这是畸形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病，是畸零社会状态在人的意识中的反应。在这样的社会中，性爱这种连接两个个体之间最有力的纽带也是畸形的了。同性恋、乱伦爱在人类文学史上已不是一个新词，然而，在美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它却来得别样的汹涌、广泛，带有特殊的社会烙印。在《喧嚣与疯狂》中，哥哥对妹妹的爱如此不正常，以至愿意和她一起下地狱(乱伦)，从而与现实彻底地隔离开。这与其说是一种性变态的心理，不如说是风雨飘零中两个孤独的畸零人抵御外部世界冷酷

的一种“相濡以沫”的温煦感情。

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年)的带有哥特式浪漫气氛和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黑夜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年)堪称美国当代哥特式小说中展示同性恋的杰作。该小说讲述了富人的儿子乔尔在晦涩的世界中探索精神出路所经历的痛苦历程。乔尔从小寄养在亲戚家中,得不到父爱和母爱,后来意外地收到生父来信,他长途跋涉前去寻找,发现父亲已瘫痪在床,他仍无法得到父亲的关心和爱护。继母的表哥伦道夫假借父亲的名义来照顾他。伦道夫是一位南方贵族的遗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精神非常空虚,他是病态社会的受害者,但又代表着病态社会的压力。乔尔开始对这位娘娘腔非常厌恶,但父亲无力呵护他,继母对他冷漠无比,小姑娘艾达贝尔的友谊又是那么微弱,终于,13岁的乔尔在黑夜的梦魇气氛下不正常地早熟了,认为自己别无出路,只有伦道夫才能给他爱的慰藉,他可以用同性恋的温情代替父爱,给他关怀,给他温暖,因此,乔尔最后心甘情愿地留在了伦道夫身边。

如果说在卡波特的孤独世界中还有一丝“爱”尚存,麦卡勒斯的世界中却是一片绝对的爱的荒漠。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年)的一生非常不幸,结婚三年就离了婚,并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床上渡过。因此,她对隔离、孤独的理解和体验比任何人都深刻,在表达孤独这一主题时,再也没有人能象她这样集中而有力,那样富于戏剧冲突和悲剧音调,那样冷酷无情。麦卡勒斯继承了福克纳的衣钵,她的作品充满了哥特式的变态与荒诞、孤独与绝望,她用畸零人的命运象征畸零的世界,在美国南方文学中独树一帜。麦卡勒斯的代表作《伤心咖啡馆之歌》(1943年)充满18世纪哥特式小说的浪漫与怪诞气氛。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南方一个住满工人的小镇上,强悍好斗的爱米丽娅小姐在新婚之夜将追求她多年的英俊潇洒的丈夫赶下床,又将他打出门,原因是不喜欢和他睡觉。当她遇到驼背小矮子李蒙表哥时,却一见钟情,为了让他高兴,还在镇上开了唯一一家供娱乐的咖啡馆,这种感情一直维持了六年。六年后,堕落成罪犯的前夫马西归来复仇了,李蒙一见马西,如同奴才见了主子,整天围着他转。为了争夺李蒙,爱米丽娅和马西在咖啡馆展开了决斗,就在爱米丽娅快要取胜的关键时刻,深受其物质、金钱、爱情之恩的李蒙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马西一边,帮助马西打败了她,又砸了咖啡馆,烧了她的酿酒厂。从此,爱米丽娅变了,她让人把屋子的门窗都钉死了,长年呆在紧闭的房间里。最后,李蒙也被马西卖给了马戏班。麦卡勒斯在这部小说中,运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畸零社会中的畸零人(生理和心理)的畸零爱情,深刻地表达了她对现实社会的完全绝望:人在社会中永远地禁锢于孤独之中,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冲破这种孤独,但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即使是具有魔力的爱也无能为力。相反,在通过爱的努力后,由于相互不能沟通,他们会受到更深的伤害,从此“躲进房间”,比以前更孤独。这也是麦卡勒斯所有作品的主题。

六 隐身黑人的抗争

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黑人在美国是备受歧视的,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不具尊严,不具人格,一无所有,他们被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1914年—)称之为“隐身人”(Invisible Man)。福克纳在他的《八月之光》(1932年)中,描写了主人公裘·里克默斯因被怀疑是黑白混血儿,因而受到黑人和白人的双重排挤和歧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后自愿走向被枪杀的命运。种族歧视所带来的矛盾到了现当代,已发展到爆炸性程度,30—40年代暴发了黑人民

权运动,60 年代的黑人抗暴运动风起云涌。黑人作家里查德·赖特(1908—1960 年)的小说在黑人觉悟的提高、白人对黑人态度和心理上的改变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的“抗议小说”开创了黑人文学创作的先河,其代表作《土生子》(1940 年)确立了他“现代美国黑人小说之父”的地位,并被公认为“黑人文学的里程碑”。

《土生子》充满了哥特式小说的暴力与恐怖。小说以 30 年代的芝加哥为背景。黑人青年别格·托马斯全家四口住在黑人区一间老鼠成灾的小屋里,因别格失业,全家生活无着,终日笼罩着阴沉、紧张的气氛。后来经慈善组织介绍,成了富有白人道尔顿先生家的司机兼锅炉工。当夜,别格开车送道尔顿的独生女玛丽小姐回家,因她酒醉不醒,只好将其抱进卧室,此时,双目失明的道尔顿太太出现在门口,叫着女儿的名字。别格怕有口说不清,用枕头捂住小姐的嘴不让她答话,不料用力过猛,玛丽被憋死了。之后他又毁尸灭迹,并嫁祸于玛丽的未婚夫。但事情最终败露,别格被电刑处死。在《土生子》中,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深刻地表达出黑人并非生来就是野蛮、残酷、凶狠,一切都是现实所迫。主人公别格从小生活在严厉的环境中,受到粗暴的对待而形成粗暴的秉性。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敌视使别格本能地敌视一切。他的生活毫无意义,绝望和仇恨使别格只能用暴力对一切作出反应。用别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得凶狠,使人人畏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别格是在无意中杀死白人小姐后才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别格通过暴力找到自我的手段,融进了他对失败和种族隔离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统治阶级是如何运用暴力进行统治和推行种族迫害的。

七 荒漠中的绿洲

福克纳、麦卡勒斯、奥康纳、卡波特、赖特、杰克逊等美国现当代作家,运用哥特式小说的恐怖、荒诞、凄凉、神秘等创作特点,无情甚至残酷地撕开社会的脓疮,毫无遮掩地展示它的丑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一荒漠世界完全彻底的绝望,相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解救世界的出路。1955 年,福克纳在访问日本期间,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人物写得那么卑劣,他说:“我认为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太爱我的国家了,所以想纠正它的错误。而在我力所能及的职业范围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羞辱美国,批评美国……美国也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作为一个民族,曾经创造过光辉、美好的事业。仅仅写美国的善良对改变它的邪恶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把邪恶的方面告诉人民,使他们愤怒、羞愧,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去改变邪恶的东西。”奥康纳也明确地表示,她是为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人们写作,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为那些自我满足、自以为是的现代读者接受,她不得不借助恐怖小说的震惊效果去吓醒他们。她认为,“对于耳背的人,你要大声疾呼;对于视力不清的人,你不得不画大而惊人的人物。”福克纳和奥康纳道出了美国现当代作家写作恐怖小说的共同目的,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就在他们无情地揭露社会丑恶的同时,依稀向我们透露出一丝美好的希望。福克纳在《喧嚣与疯狂》中,塑造了黑人女仆迪尔西的形象,她正常、健康、忠心、仁爱、忍耐而有毅力,她不畏主人的仇视与世俗的歧视,勇敢地保护弱者。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1940 年)中的黑人医生柯普兰,《无指针的钟》(1961 年)中的黑人药剂师马龙,都具有一定的精神力量,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与那些彷徨、失落、孤独、绝望、变态的文明现代人不同。在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中,老妇人自以为是现世少有的好人,临死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社会中不幸人们负有责任;

连“除了伤天害理,别无乐事”的“不适宜的人”,在枪杀了顿悟的老妇人后,内心的刺痛也会使他成为“先知”。这些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人,这些被死神“吓醒”的人,这些饱经苦难而大彻大悟的人,让我们看到了荒漠之中的点点绿洲,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活”和“人类是有希望的”(福克纳语)。

“不适宜的人”在杀害了老妇人后,深有感触地说道:“如果有人不断地向她开枪,她会是一个好妇人的。”是的,如果我们经常读一读《喧嚣与疯狂》,《抽签》,《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伤心咖啡馆之歌》,《好人难寻》,《土生子》这类骇世之作、喻世之作、警世之作、醒世之作,我们对社会和自己就会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世界就会充满笑语欢歌、温馨友爱,荒漠就会变成绿洲。

参考书目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英文),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毛信德《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High, Peter B., 1986,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Longman Inc..

Brooks, Cleanth (ed.), 1973,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akers and Ma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著,房炜、孟昭庆译《美国文学的思想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董衡巽等《美国现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钱满素等《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Haggerty, George E, 1989, "Gothic Fiction/Gothic Form",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eller, Henry, 1987, "The Delights of Terror: An Aesthetics of the Tale of Terr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进修学者,指导教师龚登塘教授)